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7~26

2017 年 8 月 29 日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双刃剑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创立主任 彼得·诺兰教授

简介

中国在将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分析方面拥有最长的持续传统。自公元前三世纪阴阳学派诞生起，辩证的分析方法就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¹ 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辩证的。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的最深刻的两种分析来自于亚当·斯密 (Adam Smith)² 和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³ 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自从古代时期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竞争以来，这种竞争不仅带来了

¹ 邹衍 (公元前 305 年~公元前 240 年) 通常被认为是阴阳学派的创始人。

² 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书中。

³ 最著名的是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和《资本论》(Das Kapital) 中，但在他所有著作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一点。

巨大的利益，也产生了深刻的问题。⁴ 在近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竞争带来的利益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带来的危机也达到了新的深度，威胁着人类的存在。对于斯密来说，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带来的动态力量与以道德为引导的政府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平衡是他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相互制衡的主题。对于马克思来说，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监管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的要旨，而这一要旨在逻辑上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发展而来的。对他而言，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为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人民群众为了共同利益逐渐形成了对政治经济体系的集体控制：“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自觉的、⁵ 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Marx and Engels, 1952: 58）。⁶ 自19世纪中叶起，发达国家广大群众的政治权利稳步扩大，国家层面的监管取得了艰难但显著的进展，其中包括最终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建立了福利体系（Nolan, 2016）。

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时期见证了全球层面爆发性的产业集约，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特征急剧扩大。为了全球物种的利益，全球性的监管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否则就没有可持续的未来。然而，全球监管仍处于起步阶段。⁷ 为了解决其深刻的矛盾，对“疯狂的资本主义”进行

⁴ 古代世界地中海一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见 Braudel, 2002。

⁵ “自觉”这一表达是在1888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添加的。

⁶ 对这方面，即马克思分析框架最根本的方面，最系统的分析可见 Avineri, 1968 和 Avineri, 1969。

⁷ 马克思虽然热情公开支持了1848年和1871年的革命，但他强调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让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情绪下直接尝试实现自己的目标“政变”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马克思对此感到担忧，即以暴力的、过早的和机会主义的方式得到的权力将具有“必然的反动特征”，“其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

的全球监管面临着复杂的挑战。虽然各种各样的活动已经建立了全球市场，但人们仍主要在各自的国家生活，具有各自的身份和利益。在是否有可能通过必要的合作来监管“疯狂的资本主义”方面，约有十亿公民的高收入国家（“西方”）和约有 60 亿公民（21 世纪末将增加到约 80~90 亿）的低、中收入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也将在为了世界大众的利益而在全球监管方面的长期的、逐步的探索中发挥核心作用。

资本主义的理性

自古以来不论东西方，行使个人自由与利润所驱动的市场扩张密不可分。这种力量，即资本主义，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和进取性，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在全球化的时代，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扩大范围以来，这些利益也变得更加显著。迄今为止，人类从大自然的束缚、从他人的控制、从贫穷和战争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工业革命前的市场竞争和创新

亚当·斯密通过他“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比喻，生动描述了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特征。市场机制的本质是一个“非零和游戏”，参与者通过专业分工和交换从中实现互惠互利。斯密认为，追求盈利的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刺激了效率的提升，通过专业分工和等价交换获得收益，而且还通过专业资本品制造者之间

主义 (Marx and Engels, 1952: 89)。1893年，恩格斯在反思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时写道：“经济进步和法国工人群众的知识水平都尚未达到使社会重建成为可能的程度”（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引言，1893）

的竞争刺激了技术进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产生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即可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些实用性为目标的人性的一种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Smith, 1776, vol: 7, 17）。

在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前的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机制推动了欧洲科学革命的巨大技术进步：

财富和伟大带来的乐趣……在想象中是一种宏大、美丽、高贵的东西，它们带来的收获十分值得我们为其辛苦和焦虑，我们自然拥有这样的感受是件好事。这种假象引起并推动了人类不断地辛勤劳动。正是这样才促使人们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建城市和联邦，发明科学和艺术并推动它们的进步，使人类生活变得高尚；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把大自然中的荒野森林变成了宜人肥沃的平原，使无痕无尽的海洋成为新生计的来源，让条条大路通往地球上的不同国家。这些人类劳动使土地的繁育能力倍增，也养育了更多的居民（Smith, 1761, 183-4）。

虽然斯密坚信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拥有动态力量，能激发创新和技术进步，但他同样明确地指出，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扮演着在市场失败时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必要作用：

政府（除了建立和平，维护法制）还有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职责，那就是建立和维护那些公共机构和公共事业，尽管这些公共机构和公共事业可能给一个社会带来最高程度的利益，但因为这种公

有的性质，其带来的利润永远无法偿还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的花费，因此不能期待任何个人或少数人能建立或维护这些公共机构和公共事业。这方面职责的履行在社会不同阶段也需要不同程度的花费 (Smith, 1776, vol. 2: 244)。

斯密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干预程度根据特定时期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可大可小。

从汉代到 19 世纪初，中国长期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是市场竞争“看得见的手”之间积极的共生性关系的结果。选贤任能的官僚主义的概念出现于汉代，并于唐代发展成其经典形式。进入官僚机构的考试关注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等内容。公务员需接受定期考试以决定晋升、降职或被解雇。考试制度不仅帮助中国在西方出现官僚制度的一千多年以前就建立了有专业能力的官僚机构，也为中国的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制度为官僚体系建立了统一的教育体系，该体系强调实用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政府官员不仅要在写作方面成为专家，而且要对历史、礼仪、天文、人事、政治机构、政府和当代事务有深入的了解。⁸ 因为该教育体系是一个以道德为核心的体系，其正当性广泛为大众所接受。⁹ 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官僚制度在保障市场经济繁荣方面承担着关键职能，包括在广阔统一的领土上维护和平，从而使得经济发展通过专业分工和交换获益；在当地和全国建设和维护水利基础设施；确保有效地避免和缓解饥荒；支持汇编百科全书和教科书，在全国传播最佳实践知识；实行保护生产者和交易者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密切

⁸ 宋代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 年）在〈材论〉一文中总结了这些要求。

⁹ 在中国，“仁”的概念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核心，也是理解人性的根本。因此，“仁”也是培养政府官员培训的基础。1694 年，黄六鸿写了一本关于地方官员教育的手册：“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中，没有比这个原则更重要的。” (Huang, 1984)

监控并采取措施以确保商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的稳定。

传统的中国经济实现了高度城镇化，在现代早期以前都远远超过欧洲。在 18 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地区，五分之二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城市不仅是生产和贸易中心，而且还具有先进开放的文化，按照现代以前的标准有着很高的识字率。长期发达的农业使中国人口从公元八世纪的五、六千万扩大到 1850 年的 4.3 亿。高密度人口和相对短缺的耕地解释了为什么从早期的发展来看私有制是土地所有权的主要形式。在唐代，签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私有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租赁形式已经普遍存在。¹⁰ 从 13 世纪的马可·波罗到 18 世纪的传教士，欧洲旅客普遍认为，中国国内的贸易量远远大于整个欧洲的总和。此外，中国南海到东南亚以及周边地区的贸易都很兴旺，主要出口中国先进的产品，包括瓷器、纺织品和铁器，以交换初级商品。受到国家支持的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带动了长期的技术进步。从唐代到 19 世纪初，长期以来由企业间竞争所带动的创新逐步发展。这些创新包括造船（包括船尾舵和水密舱）、导航（包括水手指南针）、内陆运输（包括运河闸门）、冶金（包括在高炉中使用水力双作用活塞波纹管）、瓷器（包括节约燃料的先进窑炉技术）、造纸和印刷（包括可移动模式的发展）、纺织品（包括机器和布料）、武器（包括火药的应用和管状铁制武器的制造）、采矿（包括通风井和爆炸物的使用）和深井钻井技术（钻取卤水和天然气）。在 18 世纪初，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可能已经占全球的约三分之一，而当时欧洲只占全球不到四分之一。¹¹

¹⁰ 在宋代，“不仅租一块土地必须签订合同，即使是借用一头牛也需要合同”。

¹¹ 很难比较中国和欧洲在 18 世纪中叶之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中国生产的大量产品要么是根本没有在欧洲生产，要么是少量生产。这些中国产品包括瓷器、漆器、茶叶、丝绸、棉纺织品和深井天然气。中国船只的规模远大于欧洲船只。钢铁工业和其他不同产业的相对规模也没有令人满意的估算，包括建筑材料、家具、药品、食品饮料、皮革制品、纸张、

在 18 世纪前的 1500 多年间，中国是世界技术进步的中心，远超世界其他地区。起源于中国的创新通过国际贸易转移，对欧洲在文艺复兴后经济赶超远东地区发挥了核心作用。在这个时代，许多欧洲最重要的创新都起源于中国，通过中亚和中国南海的丝绸之路来到欧洲。公元前 221 年后的大部分时期，中国长期的统一、稳定和智慧的国家行为带来了显著的长期技术进步，这些技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为欧洲迟来的技术进步做出了根本贡献。即使是工业革命的代表工具——蒸汽机也是如此，蒸汽机基本要素的“生前”根源可以追溯至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蒸汽机之父’，也没有一种文明可独揽发明蒸汽机的大功。”¹²

工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竞争和创新

经济学家就竞争性市场在产业集约方面的内在倾向性上有着对立的观点。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公司之间的竞争类似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森林中的树木”这一著名比喻，大型企业不断受到来自小而敏捷的新公司的竞争（Marshall, 1920: 315-6）。人们普遍认为，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这个过程更具影响力，中小企业与大公司竞争时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工业竞争变得“扁平

印刷和出版业等。在对中国和欧洲 1800 年前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中，应用最广泛的来自于安格斯·马迪森（Angus Maddison）（Maddison, 2010）。但是，这些比较都是推测性的，并不构成严谨的统计比较的基础。

¹² “公元1800年左右的往复式蒸汽发动机基本上由两种结构模式组成：双作用活塞风箱和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往复运动。有确凿证据表明，公元1200年前后这些结构模式就在中国广泛并有效地运行，不论后代工程师是否意识到这是他们受到的恩惠，这些模式通过一个漫长的链条将基因注入了蒸汽机。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蒸汽机之父’，也没有一种文明可独揽发明蒸汽机的大功。”（Needham, 1970: 202）

化”。另一种非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大企业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受益的机会更多，因此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是趋向于产业集约。这些意见在某种程度上都源自于马克思的分析，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的基本逻辑，即“资本集中法则”。近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速创新和技术进步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的过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Marx and Engels, 1952: 48）

1800 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此后的二百年来，全球创新被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全面主导。随着 19 世纪末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一种新的协调机制诞生了，即大型现代企业的内部规划这只所谓的“看得见的手”。巨型资本主义企业将内部规划与激烈的企业间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可以验证相互对立的分析方法的预测是否准确。在这一时期，市场力量的运行松开了在 20 世纪基本一直踩着的刹车。这段时间也见证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爆发性的并购活动。在每个产业领域，一小批广受认可的公司占据了各自行业的“制高点”，占领各自全球市场的一半以上。这是产业集约这块“冰山”可以被看到的部分。然而，来自这些领先系统的集成者企业在供应链上有“瀑布效应”，迫使他们的供应商大量整合，这些供应商又对他们的供应链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产业集约

的冰山还有在“水面以下”看不见的部分，全球都出现了高度的产业集聚。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公司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分工的程度明显增加，公司的界线有所转移，从专业供应商处采购商品和服务的比例大大增加。同时，公司的边界变得“模糊”，控制和协调的职能从核心的系统集成者企业内部向外延伸，跨越了法律定义的公司边界。巨型的寡头式系统集成企业继续激烈竞争。在3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前苏联在创新领域的衰退，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巩固了它们在高科技产品创新和全球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工业市场份额高度集中也伴随着在创新和技术进步上的高度集中。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主体位于全球企业中。在1981~2008年期间，经合发组织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占研发资金总额的比例从52%上升到65%，而政府投资的份额从48%降至35%（Royal Society, 2011）。2015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研发支出在全球排名前2500家公司（G2500）的数据（EU, 2015）。在2014~2015年间，G2500公司共投入7340亿美元用于研发，占全球企业研发总投资的十分之九以上。G2500公司的研发支出高度集中。排名前50家的公司占G2500研发总支出的40%，前一百家公司占53%，前五百家公司占82%。换句话说，在21世纪初，这大约五百家公司就是全球创新的核心。

在近期的全球化时代，巨型“系统集成者企业”之间激烈的寡头竞争以及其供应链中领军企业之间激烈的寡头竞争推动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为全球中产阶级提供高科技产品、名牌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全球化在近期时代出现了高速产业整合。在多样化的制造业中，从民用飞机、专利药品、精密医疗设备、燃气联合循环发电站、电力传输、电信设备、高速电梯、汽车、卡车、高铁、地铁系统、暖通空调系统，¹³到

¹³ 楼宇的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

软饮和啤酒，少数公司占据着全球市场的最大份额。巨型全球制造企业的供应链中也出现了同样戏剧化的产业集约过程，但是对这方面的分析和理解却相差甚远。¹⁴ 产业集约已经贯穿了世界制造业的价值链。在各个行业，少数业务高度集中的全球一、二级供应商主导着各自的细分市场或与供应链紧密相关的其他市场。为了成为全球系统集成者企业的首选客户，他们相互之间激烈地竞争。少数几家公司成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中心，这种技术进步几乎改变了所有复杂的产品并将它们互联。受少数全球企业之间激烈的寡头竞争的驱动，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进步是前所未有的。有能力满足全球企业及其供应商需求的服务业公司也在高速整合。在咨询、媒体、市场营销、法律、审计和财务信息等行业中，少数几家公司已经在各个领域占领了全球市场。

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

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大幅增加。在 1990~2015 年期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从 22540 亿美元增加到 25875 亿美元（UNCTAD, 2016）。1990~2015 年间，发达国家对内直接投资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9.3% 上升到 37.3%，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从 11.1% 增至 28.5%（UNCTAD, 2016）。跨国公司希望生产成本降低并更加接近市场，从中获益，满足当地中产阶级对全球产品的需求。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扩张刺激了其全球供应链，以便进一步接近客户，通过“准时制”供应将成本降到最低。全球系统集成者企业大部分的资源是由这些企业的地方子公司生产的。全球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全球性的平台来降低产品成本，这鼓励了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运营时，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采用统一的技术。外国直接

¹⁴ 详细分析见 Nolan, Zhang and Liu, 2007。

投资的扩大使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地区迅速实现了现代化，并体会到了“后来者的优势”。短期资本流入的自由化带来了股票市值的增加。在中等偏低收入经济体中，股票市值从 1990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5% 上升到 2015 年的 52.4%，在中等偏高收入经济体中，占比从 29.6% 上升到 62.1% (World Bank, 2004 和 2016)。股市的影响力提升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促进并购，并增加银行贷款以外的资金来源。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金融公司的出现使之成为把非金融企业的全球生产体系聚合在一起的“粘胶”，其中也包括它们的供应商和客户。金融公司为全球非金融客户提供重要服务，包括通过 IPO、并购和资产剥离进行重组，对冲货币和商品价格风险，债务发行，组织参与银团贷款，贸易金融，处理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整理工资单等。全球银行承接了所有全球化公司 95% 的国际货币流动。此外，为富裕的全球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已成为全球银行业利润来源的一部分。巨型金融公司可以为全球非金融企业以及它们的员工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巨型金融公司的优势在于在采购信息技术系统时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在多个经济体中分摊风险，并且能吸引金融界高素质人才。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金融企业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型。一轮爆炸式的并购创建了一些超大型全球金融公司，比如汇丰银行 (HSBC)、花旗集团 (Citigroup)、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高盛 (Goldman Sachs)、富国银行 (Wells Fargo)、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少数“巨型”银行的主导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提升。2008 年，仅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摩根大通收购了贝尔斯登 (Bear Stearns) 和华盛顿互惠银行 (Washington Mutual)，富国银行收购了美联银行 (Wachovia)，美国银行收购了美林证券 (Merrill Lynch)，而且都是以“甩卖价”达成交易。在前一千家银行中，前 25 家银行总资产所占的份额从 1997 年的 27% 上升到 2009 年的

45% (The Banker, July 2009)。

2015年，全球排名前20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全球五百强企业托管资产的41%，排名前50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65%的资产 (Willis Towers Watson, 2016)。2016年，在全球外汇交易中，前五大金融机构占了45%，前十家占67% (Euromoney)。¹⁵ 2016年，前十大银行在全球投资银行业务收入中占48%，前20家银行占62% (Statista.com)。2014年，前四大银行在托管资产中占全球的81% (Forbes)。亨利·考夫曼 (Henry Kaufman) 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转变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包含着巨大、多元化整合企业的寡头垄断。这场革命并未引起重视。” (Kaufman, 2009: 97)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大片地区，国际银行开展了广泛的收购，并主导了金融行业。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经济体得益于高收入国家监管机构在公司治理方面高标准的要求。2004年，《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发表了很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Why Globalisation Works*)，其中写道：“外资银行比例较高、国有银行比例较低的国家更不容易发生金融危机，这也许是因为外资银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管理更好，或者只是因为它们能更好地应对草率放贷的压力” (Wolf, 2004: 284)。世界银行认为，“更愿意将对银行的多数控制权交予外国利益方”的转型经济体增长率较高 (World Bank, 2002: 86)。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数学建模的进步大大提高了金融机构风险评估的能力。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诞生，特别是大量不同种类的衍生品，深深在金融系统中植入了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发展使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如此“厚实”，几乎到了坚不可摧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全球金融体系经历了一系列金

¹⁵ 包括九家全球银行以及 XTX Markets 电子交易平台。

融危机并幸存下来，包括墨西哥、东亚、俄罗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阿根廷危机以及 9.11 的影响，这似乎生动地证明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大大提升。

资本主义和人类自由的扩展

摆脱大自然的束缚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人类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人类并未面临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不足的风险，技术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按照每桶 70 美元的价格，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取之不尽”，包括利用更先进的提炼技术从现有油田获取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自煤（煤液化）、焦油砂和页岩中的气体，以及页岩气和“晶体中的气体”。来自市场的压力促使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一次能源量大幅降低。1990 年，每千克石油当量的一级能源消耗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为 5.5 美金（按 2011 年的价格计算）。到 2014 年，增加到 7.9 美元，上涨 44% (World Bank, 2016)。若干相关领域也实现了技术进步，如果适当的监管措施能够落实，就有可能将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稳定在当前水平。这些技术领域包括建设更多的核电站、提高建筑技术水平、风力发电机、重新造林、化石燃料发电厂的碳捕获与封存、光伏电池、用燃气替代燃煤电站。

在巨型汽车、卡车、火车、飞机和船只制造企业之间凶猛的寡头竞争的推动下，交通技术高速发展。造车、发动机设计、材料利用和新型信息技术集成等领域的新技术大大降低了车辆的自重，减少了燃油消耗和维护成本，同时持续改善了车辆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人和货物的运输成本急剧下降，给人类福祉带来很多的积极影响。这个时代也见证了由大型 IT 公司之间的寡头竞争所驱动的电信革命。到 2015 年，在低收入国家，60% 的人口是移动电话用户 (World

Bank, 2017)。在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这个比例为 90%，而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中则为 105%。这个时期的电信功能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但电信的实际价格却不断下降。这些变化反映出世界各地在福利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包括为发展中国家众多人口所提供的福利。

摆脱他人的控制 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1965 年，发展中国家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到 2015 年，低收入国家已有 31% 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 (World Bank, 2017)。在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这个比例是 39%，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中达到 64%。城镇化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一般而言，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在家庭中获得了更高的自主权，尤其是父母给予的自主权。与农村地区相比，城镇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城镇地区能提供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教育机会，便于提高自身技能，也为大众自主创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即使在最贫穷的移民中，也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农村生活。

摆脱不平等 和工业革命至 1970 年代期间，全球收入的不平等情况日趋恶化，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衡量收入分配的全球基尼系数从 1800 年的 50% 增加到了 1980 年代的 66% (Milanovic, 2016: 120)。然而，在最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 GDP 增长率显著超过了发达国家。1990 年至 2016 年期间，发达国家占世界 GDP 的份额（按购买力平价价格计算）从 63.7% 下降到了 41.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从同期的 36.3% 上升到了 58.1% (IMF, 2017)。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增加了，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更快。1990~2005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年人均产出增长率为 3.1%，而发达国家年人均产出增长率仅为 1.8% (UNDP, 2007)。产出和收入增长的差异是造成衡量收入分配的全球基尼系数下降的主要因素。1988~2011 年间，全球基尼系数从 72.2% 下降至 67.0%，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不平等情况第一次停止恶化”

(Milanovic, 2016: 119)。1988年以来，收入水平的最大获益方来自全球收入分配的中间部分，即分布在收入分配第40~60百分位的人口，主要位于中国，以及印度、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Milanovic, 2016: 19)。1988年以来，“全球中间阶层”的相对重要性大幅增加，他们每人每天的平均收入水平位于2~16美元之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05年美元购买力)。在这一时期，这一“中间阶层”人口在全球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3%上升到了40% (Lakner and Milanovic, 2015: 225)。

摆脱贫困 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来说，最重要的发展目标就是摆脱绝对贫困。低、中收入国家的人口从1980年的36亿增加到2015年的62亿。尽管人口大幅增长，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世界人口中每天生活费不到1.90美元(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比例从1990年的34.8%下降到2013年的10.7%(World Bank, 2017)。同一时期，在东亚太平洋地区，该比例由60.2%下降至3.5%，在南亚由44.6%下降至15.1%。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从1990年的50岁增加到2015年的62岁(World Bank, 2017)。同期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从60岁增加到68岁，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从68岁增加到75岁。这些进步部分归功于医疗设备和药品领域的技术进步，以及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包括改良种子和农场设备和更加有序的食品市场，以及有助于有效传播知识的信息技术的进步，更优化的食品运输系统和降低浪费的食品加工技术。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在1990~201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¹⁶从0.514上升了30%，达到0.668 (UNDP, 2017)。

全球性文化 康德(Emmanuel Kant)在1784年写了题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¹⁶ 人类发展指数是从三个维度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指标——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

Cosmopolitan Purpose) 的文章，其中他提出，历史包含着“大自然的一个隐蔽计划”：这个计划让人们看到未来令人感到安慰的前景，大自然种下的所有萌芽都得以充分发展，人类的命运得以在地球上实现 (Kant, 1784: 52-3)。他认为，“大自然的最高目的”是“普遍的世界性的存在”，这一点最终将通过“让人类所有的原始能力得以发展的条件”的不断发展得以实现 (Kant, 1784: 51)。资本主义国际化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抵抗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Marx and Engels, 1952: 47)。

在近期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互联的全球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一逻辑的结果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观点的核心：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个别国家的精神创造成为了共同财产 (Marx and Engels, 1952: 46)。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打破国家经济边界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38% 上升到 2015 年的

59% (World Bank, 2004 和 2017)。大型企业在市场、所有权、管理和内部沟通语言方面都日益国际化。在 1987~2008 年期间，共有 2219 次超过十亿美元的跨国并购 (UNCTAD, 2009)。换句话说，超过 2200 家公司“放弃了此前所在国家的护照”，加入了另一个国家。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情况，一国的“国家冠军”型企业是由外国人领导的，而且外国人所占的股份比例超过了其总部所在国机构的占比。英语成为大多数国际公司的通用语言。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众多人口中塑造了一种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出境旅游人数从 1990 年的 3.8 亿增加到 2015 年的 13.6 亿 (World Bank, 2004 和 2017)。英语已成为全球大众媒体的通用语言。奥运会、世界杯这类国际体育赛事汇聚了世界众多人口。2008 年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世界中发生重大国际冲突。

资本主义的非理性

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加剧。人类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摆脱了根本的制约因素，人类将自身能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们对自己所创造的结构也前所未有地失去了控制。全球资本主义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独特的严重威胁，但同时也将人性从根本制约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创造了一种多面的、不受控制的疯狂的怪物，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分析的这一过程推向新的高点：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生产和交换的关系，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 (Marx and Engels, 1952: 49)。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引用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那段著名的话: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任的时期, 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绝望之冬, 我们拥有一切, 我们一无所有 (Dickens, 1859)。

环境

蕾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 在《沉寂的春天》 (*The Silent Spring*, 1962 年) 一书中警示人们, 如果人类继续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可以被利用的资源, 而不能意识到人类只是这个有生命的综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将产生毁灭性后果: “哪种文明能在不破坏自己的情况下对生命无情地开战, 而不会丧失被称为文明的权利? ‘控制大自然’ 是一个傲慢的说法, 它源于尼安德特人时期的生物学和哲学, 当时人们以为自然界是为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 (Carson, 1972: 99 和 257)。她的恐惧变成了现实。世界自然基金会建立了地球生命力指数, 该指数追踪世界各地的 3706 种脊椎动物种群数量, 包括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 (World Wildlife Fund, 2016)。在 1970~2012 年间, 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 58%,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表明人类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削弱自然生态系统的力量。高收入国家的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已经在 1970 年后停止下降。然而, 在 1970~2012 年期间, 全球海洋种群数量下降了 36%, 陆地种群数量下降了 38%, 淡水种群数量下降了 81%。哈佛生态学家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Wilson) 警告说, 如果目前物种灭绝的趋势继续下去, 到 21 世纪末, 人类将会生活在一

个“孤独的时代”。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扩张与长期加剧的环境恶化有关联。贫困国家都难以绕开从“贫穷但干净”到“富裕但污染”的过渡阶段，而后才能向“富裕又干净”的状态迈进。例如，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 PM2.5 空气污染指数平均为每立方米 58 微克，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为 42 微克，与高收入国家的 17 微克形成对比（World Bank, 2017）。在南亚，这个指数是 74 微克，在埃及达到 105 微克，而北美则只有 8.3 微克。市场驱动全球企业的创新将在减少发展中国家大气污染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国家的政府监管¹⁷ 也是必不可少的，以克服由于市场经济协调不足造成的严重城市污染问题。

1990~2013 年，世界能源消耗增加了 54%（World Bank, 2017）。尽管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进展，但 2013 年化石燃料仍占能源消耗总量的 81%，与 20 年前相比没有显著变化。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1990 年的 224 亿吨上升到 2014 年的 358 亿吨，增加了 60%（World Bank, 2017）。其中 92% 的排放量来自低、中收入经济体。虽然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高出很多，但 2013 年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为 1.4 公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为 6.6 公吨，而高收入国家为 11.0 公吨。高收入经济体在使用化石燃料方面陷入了恣意浪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高收入国家主要依赖卡车和汽车的货运和客运系统。在中等偏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每千人机动车保有量不到 50，中等偏高收入国家每千人机动车保有量约为 200，而在欧洲约为 550，美国约为 800。2013 年，在所有高收入经济体中，人均消费一次能源 4780 千克（石油当量），北美地区人均消费

¹⁷ 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大气污染方面的政府监管措施，也包括在发达国家，以此激发全球企业在环保领域的创新，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提供产品。

6981 千克，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为 2181 千克，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仅为 640 千克（World Bank, 2017）。尽管 2000 年以来高收入经济体的碳排放量已经趋于稳定，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碳排放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全球商业革命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并购活动爆发，企业大规模剥离非核心业务，出现了戏剧性的产业集约过程。¹⁸ 全球领军企业充分利用在采购、研发、财务、品牌和人员招聘方面的规模经济效益，提高他们在其核心业务全球竞争中的地位。他们的主要客户是全球中产阶级和其他全球性企业。除此之外，在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它们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为穷人和小型的低技术企业提供低质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和低价位的服务。世界上的穷人消费的主要是无品牌（或假品牌）、低技术、本地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的“非正规领域”的世界。也是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世界，这里居住着一大批充满竞争性的匿名公司。这与全球性企业所在的世界完全不同。对这个领域的政治经济研究少的可怜。¹⁹

¹⁸ 企业在并购的同时为聚焦于拥有全球竞争力的核心业务而剥离其他业务这一对称的过程几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西门子的案例是这一过程的生动说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西门子卖掉了以下子公司：西门子富士通（个人电脑）、英飞凌（半导体）、博世西门子（家用电器）、欧司朗（照明）、VDO（汽车零部件）、德利多富（ATM 机）、西门子手机和诺基亚西门子（电信设备）。除了这些大规模的资产剥离，西门子在密切相关的发电和供电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收购，并且越来越多地聚焦于数字技术在电力方面的应用，这也使其内部软件能力稳定提升。

¹⁹ 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是《金字塔底层的财富》（Prahalad, 2004）。然而，这本书的标题背后表明的是对收入处于世界后 50% 人群所处的商业和社会生活现实缺乏了解或兴趣。相比之下，终生都在研究印度非正规经济的詹·布莱曼（Jan Breman）对该领域政治经济的

经过 30 多年的全球商业革命，商业力量集中在总部设于高收入国家的少数公司手中。虽然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有明显的提高，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现代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出是由总部位于高收入国家的公司设在当地的子公司所生产的。到 2015 年，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在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仍然仅占 21%。2015 年，共有 76 次金额超过 30 亿美元跨国并购，但其中仅有三次是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的（UNCTAD, 2017）。在世界前一百名跨国公司（按资产计算）中，只有五个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没有一个是高科技领域的公司（UNCTAD, 2017）。²⁰ 尽管这一时期大公司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大部分的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来自高收入国家。2015 年，在按照市值排列的全球财富五百强企业，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占总市值的 86%，仅来自美国的企业就占全球总数的 48%。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只有 73 家，其中 43 家来自中国。在财富五百强企业，拥有 13 亿人口的印度所占的总市值还不到人口只有八百万的瑞士的一半。中、低收入国家的财富五百强企业大多只来自四个行业：银行和金融服务业（29 家），电信业（五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七家）、建筑业（五家）。这些行业虽然也使用高科技，但本身并不产生大量的新技术。他们主要是国有企业，大多在国际竞争中受到高度保护。在高科技、品牌商品和全球服务等一系列领域，财富五百强企业中要么完全没有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²¹ 要

深刻研究（Breman, 1996 和 2013）却几乎被社会科学家及商学院研究人员忽视。

²⁰ 这五家公司分别是中海油（排名 45）（中国，石油和天然气）、马石油（排名 73）（马来西亚，石油天然气）、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排名 76）（中国，运输）、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排名 95）（墨西哥，电信）和淡水河谷（排名 98）（巴西，采矿）。

²¹ 包括以下行业：航空航天、化工、电子和电气设备、保健设备和服务、媒体、石油设备和服务、个人用品、技术硬件和设备，旅游和休闲。

么只有一两家。²²

在很多的行业中,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企业主要是在受保护的市场上经营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它们很少与全球领先的企业直接竞争,而这些企业往往只侧重于少数关联性很强的核心业务,并在其中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或品牌。几乎全球每个行业位于价值链上游的企业都来自发达国家。例如,2012年航空航天业全球排名前35位(按收入计算)的企业中,包括系统集成商和部件系统供应商在内,只有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巴西)(European Commission, 2013)。其收入和研发支出(分别为33亿欧元和8600万欧元)与波音(分别为819亿欧元和23亿欧元)相比简直微不足道。2015年全球排名前40的汽车装配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企业(按收入计算)中,仅有两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塔塔汽车公司和上汽集团(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塔塔汽车和上汽集团在收入和研发支出方面与其巨大的全球竞争对手相比,也仅占它们的一小部分。²³

在现代产业中,研发是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在研发总投入中占大部分:在全球排名前2500的公司中,91%的研发支出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企业,而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占比不到十分之一(European Commission, 2015)。其中仅五百家公司的研发支出就占2500家公司研发支出总额的五分之四以上。在前五百家企业中,

²² 包括以下行业:汽车和零件、电力、工业、人寿保险、制药和生物技术、软件和计算机服务。

²³ 塔塔汽车在印度国内市场的份额不大,而且仍在下滑。塔塔在印度国内市场上是亏损的,主要依靠收购捷豹路虎以后的国际收入。上汽集团主要依靠的是与通用和大众成立的合资公司所带来的收入和技术。2015年,塔塔汽车和上汽集团的收入分别为270亿欧元和660亿欧元,研发支出分别为十亿欧元和七亿欧元。同年,大众的收入是1970亿欧元,研发支出为117亿欧元(European Commission, 2016)。

只有 39 家来自中、低收入国家。此外，中国目前是全球前 2500 家企业所在国中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占研发总支出的 5.9%。瑞士、瑞典和荷兰这三个欧洲小国总人口约为 3500 万，却占前 2500 家企业研发支出的 8.4%，比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还要多。在全球工业生产领域，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几乎在每个行业都至关重要。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革命不仅改变了大多数制造产品的性质，而且为服务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包括金融、零售和大众传媒，以及大型全球化企业的内部运作和在价值链中的关系。总部设在美国的那些公司是全球信息技术行业的中心，在前 2500 家公司中，它们的信息技术硬、软件支出占总额的 67%。

全球不平等

在过去的 30 年中，全球化公司明显降低了他们对总部所在国家政治经济的依附度。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跨国公司中，国际化资产、收入和就业的占比大部分都超过 50%，而且往往远远超过这一数字（UNCTAD, 2016）。²⁴ 全球精英阶层诞生了，其中成员都来自领先的全球化企业。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收入却非常高。他们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共享国际化的文化。他们读着同一份报纸——《金融时报》，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他们都喜欢住同样的全球豪华酒店，购买同样品牌的奢侈品。他们在不同国家拥有住宅。他们的孩子都上同样的国际私立学校，毕业于同样的全球精英大学。他们都参加国际性会议，比如达沃斯经济论坛。他们对自己出生国的依赖度越来越低。2010 年，

²⁴ 例如，通用电气（美国）和大众（德国）的跨国化指数（TNI，海外资产、收入、就业占公司总资产、收入和就业比例的未加权平均值）为 59%，强生公司（美国）为 65%，西门子（德国）为 66%，壳牌（英国）为 74%，西班牙电信公司 Telefonica 为 77%，WPP（英国）为 87%，百威英博（比利时）为 93%（UNCTAD, 2017）。

世界收入最高的 1% 人口至少拿到了全球收入的 16%，如果再加上有关报低个人收入的合理假设，这个比例可能高达 28% (Milanovic, 2016: 41)。在 1988~2008 年期间，全球收入最高的 1% 人口的实际收入预计增长了 65% (Milanovic, 2016: 11 和 41)。由于这样的高收入，1988~2008 年间，前 1% 人口占全球收入增长的 19%，最富有的 5% 人口占总增长的 44% (Milanovic, 2016: 24-25)。世界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前 1% 均“压倒性地来自富裕经济体”，其中 50% 来自美国，其余的“几乎都来自西欧、日本和大洋洲” (Milanovic, 2016: 2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近几十年来全球收入差距大幅缩小，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同时印度的加速增长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全球收入差距水平仍然很高。尽管全球基尼系数从 2000 年的 0.73 下降到 2011 年的 0.67，但这个数字仍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系数：“如果这种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发生在较小的社区或国家，监管当局会将其视为一个不稳定因素，不可能坐视不管，否则就可能爆发革命或暴乱”

(Milanovic, 2007)。全球收入差距水平持续较高的主要解释仍然是“公民溢价”，全球差距的 70% 归因于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 (Milanovic, 2016: 129)。²⁵ 虽然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大幅增加，但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年收入（按照 2005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仍然只有一千到二千美元，而高收入国家则可以达到五千至一万美元 (Milanovic, 2016: 29)。

全球收入分配已经达到极端不平等的程度，但全球财富的分配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估计，全球财富排名前 1% 人群所占的财富份额从 2000 年的 32% 上升到 2010 年的 46% (Milanovic, 2016: 41)。据瑞士

²⁵ 全球收入差距中由各国平均收入差异所导致的比例从 1800 年的 18% 增加到 1990 年的最高值 — 78%，2010 年达到约 68% (Milanovic, 2016: 129)。

信贷估计,世界家庭财富从2000年的约120万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56万亿美元,是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倍(Credit Suisse, 2016)。据估计,世界财富排名前1%的成年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51%,前5%的人占78%,前10%的人占89%,而排在后50%的人口仅拥有不到1%的全球财富。²⁶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造成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不平等分配,引人深思。

富裕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全球市场的整合给包括美国在内的高收入国家公民带来了互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进口消费品实际价格下降,有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市场整合也造成了不平等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自由化使“转型中”和“发展中”国家开放了大量的低价劳动力:2008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总劳动力数量为5.02亿,而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总劳动力数量为26.01亿,其中仅中国和印度就占12.27亿(World Bank, 2010)。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方式主要是向贫穷国家转移资本和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出口商品和服务。这使均衡各国工资和工作条件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导致一大批低技术的白领岗位被取代,而对服务业非技术型工种的需求却激增,如餐饮、零售和家务服务领域的工作。全球化时代高收入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1970~2011年期间,美国税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44上升到0.52,德国从0.38上升到0.52(Milanovic, 2016: 108)。1969~2001/2002年期间,英国的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从0.33上升到0.53(Grazeley, 2014: 174)。直接税收和社会转移支付大大降低了高收入国家最终收入层面的差距,但这个时代

²⁶ 世界财富排在全球后一半的成年人口每人仅拥有不到2200美元,后20%的成年人每人拥有不到159美元。2016年,北美成年人口人均财富拥有量为33万7078美元,欧洲为12万5460美元,印度为3835美元,非洲为4261美元(CreditSuisse, 2016)。印度成年人的中位数财富为每人608美元,远低于平均水平。

仍显示出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美国，直接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 0.36 上升到 2011 年的 0.41。在德国，从 1980 年的 0.28 上升到 2011 年的 0.31 (Milanovic, 2016: 108)。在英国，从 1969 年的 0.25 上升到 2001~2002 年的 0.33 (Grazeley, 2014: 174)。²⁷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内部差距的扩大，这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相关。在快速发展的低、中收入国家，伴随着当地现代资本主义产业的扩张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的增长，这些部门使这些国家的就业和薪酬进入了“21 世纪”，工资和工作条件基本都执行全球标准。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产业就业的人口只占非农业人口的一小部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非农业劳动力都在“非正式”行业中工作，通常就业机会不稳定，社会福利低或根本没有，工作条件通常较危险，而且没有工会保护。在 2009~2010 年间，中国非正规就业占全部非农业就业的比例约为 33%，泰国为 42%，越南为 68%，菲律宾为 70%，印度尼西亚为 73%，印度为 84% (IMF, 2016)。在印度的非正规产业中，79% 的工人是“贫穷而脆弱”的，只有 21% 处于“中高收入”水平 (Breman, 2013: 96)。在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城镇非技术型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受到根本的制约，导致大部分利润被资本所有者获取。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地区，这些因素导致加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 1990~2013 年的亚洲，人口加权后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 0.37 上升到 0.48 (IMF, 2016)。中国在收入差距方面位于亚洲前列，收入差距基尼

²⁷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直接税收和支付转移后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接近社会主义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系数从 1995 年的 0.35 上升到 2010 年的 0.53 (Kanbur, 2017)。然而，从那时起，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稳步下降，2014 年为 0.495。部分原因是政府针对最低工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农村医疗保险体系出台了政策。但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正在通过“刘易斯拐点”，因此城镇非技术型和半技术型工人的实际工资面临上行压力。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仍然身陷刘易斯发展阶段，孟加拉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结束这一阶段。

金融业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就曾警告过银行业集中会给实体经济造成危险：

说到集中化！聚焦于所谓的国家银行、大型放债人和周围高利贷者的信贷体系构成了巨大的集中化，赋予这群寄生虫阶层神话般的权力，他们不仅不时地掠夺工业资本家，还要以最危险的方式干涉实际生产。这帮人对生产什么都不懂，与生产毫无关系。（Karl Marx, 1971: 544-545）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成立的巨型全球银行像“粘胶”一样将全球商业体系聚合在一起，不断地迫使国家金融当局放松对金融行业的控制。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成为“监管被俘”的过程在西方金融体系统中蔓延 (Johnson, 2009)。金融市场从国家性到全球性的转型并没有配套同步加强的国际监管治理。本应作为引领全球金融体系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恰当地描述为“在流动性的海洋中无舵的航船”。此外，全球金融体系发展出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导致即使存在进行监管的政治决心，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监管整个体系。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学

家和政策制定者都相信，金融体系本身具备自我监管的能力，只需要利用中央银行的利率策略略微体现货币政策的影响力，从而实现经济体系的稳定。2004年，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表示：“我认为，货币政策的改善可能是‘大缓和’时代来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不相信过去20年宏观经济波动性的下降只是走运的结果”（引用自 Wolf, 2013）。

事实上，金融市场有着内在的投机倾向和资产价格泡沫。凯恩斯在他的著作中就强调过金融投机的风险：“如果企业稳定运行，投机者的泡沫不会造成伤害。但是一旦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中的泡沫，情况就严重了。当一国的资本发展成了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事情可能已经搞砸了”（Keynes, 1936: 159）。事实上，金融市场上的泡沫“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一定要就投机泡沫是否会存在进行辩论，那应该由持反对观点的人提供证据，证明泡沫为什么不会存在”（Shiller, 2001: 67）。金融泡沫的最初起因往往是认为经济进入了“新时代”而产生的乐观主义。货币扩张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一旦投机的过程进展良好，有力的正反馈循环就会推动市场越走越高（Minsky, 1986）。信贷扩大的基础是抵押资产价格的上涨，继而支持了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进一步的信贷扩张。尽管货币当局努力控制货币供应，但在资产价格通胀期间货币供应往往会扩大，为投机提供资金。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最近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更能带来“新时代”的感觉，在这一时期，无数种形式的货币大量增加，在西方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产泡沫。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资产价格泡沫为信贷的爆炸性增长奠定了基础，为投机和流通消费提供资金。1995~2007年期间，美国的房价上涨了约60%，西班牙上涨了70%，英国为170%（Wolf, 2013）。1985~2007年期间，美国私营领域的债务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0%上升到300%（Wolf, 2013）。

2000~2007 年期间,全球债务每年增长 7.3%,从 87 万亿美元增加到 142 万亿美元。到 2007 年,全球债务总额是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2.7 倍 (McKinsey, 2015)。债务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业本身,2000~2007 年之间每年增长 9.4% (McKinsey, 2015)。在英国,金融行业的中间值杠杆从 2000 年的 20 比 1 上升到 2007~2008 年的 50 比 1 (Wolf, 2013)。资产价格通胀和负债总额的大幅上涨促使家庭增加了在消费和住宅投资领域的支出。

无论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还是之后,巴塞尔协议中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规定为资产价格通胀增加了另一个维度 (Watling, 2017) 前后三版国际巴塞尔协议推动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节节攀升。每一轮巴塞尔协议更新中,抵押贷款的风险都被认为越来越低。在 1992 年的第一版巴塞尔协议中,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被设定为 50%。2004 年通过的第二版巴塞尔协议中,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被降至 35%。此外,第二版巴塞尔协议还更进一步,向银行提供了一个可以自行计算内部风险权重的选项。2010 年通过但尚未(完全)实施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抵押贷款风险权重标准可能再次下降。使用内部计算方法后,英国大型银行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目前约为名义贷款价值的 12%。不难看出,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大幅降低了英国银行(单位抵押贷款业务)的资本要求。同时,抵押贷款资本要求也远低于对公贷款资本要求,仅占后者的八分之一。1979 年以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英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增加了七倍。抵押贷款债务的大幅增加是英国房价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也是家庭债务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类似情况普遍存在于所有高收入国家中。

在西方世界,政府不希望“在酒宴正酣之时撤走酒杯”,这样会激怒拥有房产的选民,影响投票。名义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受到指示它们只

需要关心消费者物价通胀，不需要关心资产价格的通胀。西方世界政府官员特别认为资产价格通胀“不属于中央银行的管理范畴”（Sender, 2016）。为应对消费者价格通胀所做的决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策选择。因为这类政策允许金融机构利用资产价格上涨为自己和客户赚钱，他们深知，资产价格上涨是一种“单向押注”，因为欧洲的法律和美国的政策都不允许中央银行干预这块广阔的赚钱领地。全球金融体系已经跨越国界深度实现了全球化，甚至远远超过了生产体系的整合程度。大规模的重新包装和销售债务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都实现了深度整合。这增强了金融体系面对相对小规模危机的抵御能力，但也意味着，一旦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将更容易受到冲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失去约束的信贷体系所造成的不稳定性（Minsky, 1986）。在2008年10月6~10日的一周时间内，大坝崩塌了。纽约股市下跌23%，伦敦下跌21%，东京跌25%，法兰克福22%。新兴市场的股指下跌了26%。领军银行的股价暴跌。世界金融市场面临末日的到来。10月13日星期一《金融时报》的社论标题是“银行业的午夜前的一刻”：“西方世界银行系统的遭遇等同于心脏骤停。任何机构在市场上的融资时间都极其短暂。足以见得由于恐慌导致的信心崩溃击垮了整个系统……世界金融体系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必须重新开始。”2009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8%，欧元区下降4.5%（IMF, 2017）。到2009年初，欧元区的整体失业率达到9.7%，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0.9%。

这场危机推翻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即由股东所有制银行所构成的金融市场只需宽松监管便可以实现自我纠错。2008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霍斯特·科勒（Horst Kohler）针对自由化的全球金融市场得出了振聋发聩的结论：“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用极少资

本进行巨额杠杆交易的可能性让这只怪物长大……这场危机唯一的好处是，它已经向金融行业所有有思想的负责人明确指出，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发展成了一只怪物，必须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Benoit and Wilson, 2008）

在全球层面，2010年，高收入国家同意小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²⁸然而，美国的投票权却仅有小幅下降，这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决定上仍然拥有否决权。²⁹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继续由欧洲人担任。³⁰国际清算银行（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为应对危机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其中不仅包括高收入经济体，还包括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六个发展中经济体。金融稳定委员会在执行2013~2019年期间的“巴塞尔协议III”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有助于更好地吸收冲击，引入反周期的资本缓冲，并减少复杂、难以理解的金融衍生工具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作用。

在高收入经济体中，应对危机的政策几乎完全集中在货币政策上。³¹

²⁸ 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从40.5%上升到44.8%，但直到2016年1月美国国会才通过了这一变化。

²⁹ 美国投票权的比例从16.72%下降到16.62%。

³⁰ 法国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持续担任总干事，直到2011年离职后，由法国女性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接任，2016年她开始了第二个五年任期。

³¹ 应对危机的其他方法没有引起重视，包括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再分配，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刺激消费者需求，通过增加对收入和财富的税收以及国家组织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更高能效的运输、建筑和供电，并提高教育水平，以发展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所需的技能。对养老基金和资产管理来说，这些能带来安全收益的长期投资可以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来源。这种方法本可以帮助巩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力量所破坏的社会结构。拒绝采用这一方法反映了政治远见的短缺。在没有采用这种做法的情况下，自2007年以来，高收入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严重下降，导致了高收入国家右翼和左翼

2008 年底至 2009 年底，美国中央银行的干预率已经从 5.2% 下降至 0.2%，欧元区从 4% 下降至 1%，英国从 5.7% 下降至 0.5%，日本从 0.5% 下降至 0.1%。高收入国家的中央银行大规模购买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债券（“量化宽松”）。³² 到 2014 年，美国、英国、日本央行分别持有 16%、24% 和 22% 的国家未偿付债券，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60%，在美国和英国为 25%，欧元区为 21% (McKinsey, 2015: 33)。中央银行大量购买国债刺激了债券价格上涨，压低了债券收益率。在美国，十年期国库券的收益率从 2008 年的 4% 下降到 2016 年中期的 0.02%（2016 年 8 月 2 日《金融时报》）。到 2016 年 7 月，全球负收益率政府债券的总量达到 13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政府债务的 30%（2016 年 8 月 3 日《金融时报》）。固定收益市场上掀起了债券购买的狂潮，涌动着“对主权债务惊人的投资欲望” (Platt and Badkar, 2016)。

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主要是利用货币政策重新触发在金融危机期间被刺破的资产泡沫，从而刺激消费支出：“货币政策降低了利率和并支持资产价格上涨，以刺激消费，避免金融危机之后发生更深层、更长期的经济衰退” (Bank of England, 2012: 11)。英格兰银行坦率地承认了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通过推高一系列资产价格，购买资产能扩大家庭所持有的养老金以外的财富，但持有水平呈现很高的倾斜度，前 5% 的家庭持有 40% 的资产” (Bank of England, 2012)。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大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但对股市的影响却是戏剧化的。美国股市市值从 2007 年的 19.9 万亿美元大幅下跌至 2008 年的 11.6 万亿美元，对美国公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影响了他们对养老金前景的预期。到 2016 年，美国股市市值恢复到 27.4 万亿

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兴起。

³² 这意味着政府的一部分 — 中央银行，正在从政府的另一部分 — 国库，购买债务。

以上，远远超过了危机前的高点。在全球性城市和许多高收入国家，房价恢复了上涨的趋势，债券价格也大幅上涨。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在 2007~2014 年期间，债务总额每年增加 5.3%。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都大幅上涨，其中家庭债务增加了 40 万亿美元。然而，增长最快的是政府债务，2007~2014 年期间每年增长 9.3% (McKinsey, 2015)。到 2014 年年中，日本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 400%，法国达到 280%，英国 252%，美国 233%，德国 188% (McKinsey, 2015)。

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却远低于期望值。2008 年以后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未能帮助高收入国家回到危机前的增长轨迹上。机构投资者寻求机会投资股票、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资产，而不是投资于建筑、工厂和机械，企业则利用低成本的借债大量投资自己的股票。在 G7 经济体中，投资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左右下降至 2005~2007 年间的 22%。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认为：“世界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境地。我们不应忘记现在的情形是多么地奇怪和令人不安。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能完全消除重蹈覆辙的危险” (Wolf, 2013)。

结论

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通过竞争追求利益的资本主义自由处在人类进步的中心位置。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人类进步的速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在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刺激下，尤其在寡头企业争夺全球领先市场的过程中，技术取得了空前的进步。然而，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这些矛盾发展到了新的深度，给人类的生存造成了达尔文式的威胁。近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竞争拥有引发商业

力量集中的趋势，可能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并引发金融系统对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和他同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马克思把自然世界看作是为人类智慧所利用的资源。他对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没有认识。他也无法想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环境下，民族认同和各国在政治活动核心位置上的持久程度。

如果人类要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就必须建立机制，遏制无约束的全球资本主义这只“弗兰肯斯坦怪物”。在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矛盾方面，有许多国家层面可以实施的政策，包括税收、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政策。³³ 然而，解决这些矛盾越来越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各国之间常常会出现利益分歧。对大多数人来说，“全球”不是他们的参照系或身份来源。除了家庭和宗教之外，“国家”是大多数人身份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发出政治声音的主要场所。尽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日益国际化，但公民眼中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政府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富裕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但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分歧。此外，自 19 世纪初以来，富裕国家一直主宰着全球经济、文化和军事关系，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这只是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适应这一时代的终结对高收入国家的公民和政府来说是一个全面的挑战。

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这只“野兽”越长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对于生育和培育了这只野兽的人类来说，也更加有必要建立一个规范其活动的道德框架，从而防止这只野兽吞噬它的创造者——人类。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矛盾，除了探索国际合作外别无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集体智慧的产物。

³³ 产业政策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提高国家生产率的广泛支持性措施，瞄准某些行业，支持地方产业，以及瞄准国家冠军企业。工业政策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的规模、自然资源基础、地理位置、政治传统、政府能力以及国际关系。

人们共同选择的施展这种智慧的方式取决于道德。道德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指引道路的“北极星”。亚当·斯密直观现实地描述了市场竞争在追求“财富与伟大”的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力量。但是，他认为，人类的心理需要社会凝聚力，作为一个能让所有公民都获得幸福的好社会的基础：

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彼此的帮助……如果通过爱、感恩、友谊和尊重给彼此提供必要的协助，社会就会蓬勃发展，幸福快乐。爱的纽带将所有成员连接在一起，凝聚在一个友好互助的共同核心周围（Smith, 1761: 85）。

在斯密看来，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仁爱是社会安定和谐的基础：

多为他人，少为自己，克制自私，放纵仁慈，构成了人性的完美；只有这些品质能在人类中创造情感与激情的和谐，体现他们的仁爱 and 礼义（Smith, 1761: 25）。

然而，斯密所谓的“好社会”不只停留在个人眼前社会的层面，甚至不仅限于国家的边界：

聪明而有道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了特定秩序或社会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也愿意为了国家或主权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即这种秩序或社会的利益。因此，他应该同样愿意为了宇宙的更大利益，为了上帝直接主宰的一切理智而智慧的人类的更大利益，而牺牲所有的次级利益……他必须考虑到为了全宇宙的繁荣可能降临到自己、朋友、他的社会或国家身上的一切不幸（Smith, 1761: 235）。

为了“天下为公”的共同利益，建立全球监管机制以制约资本主义

竞争的野兽，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不同利益、不同文化的国家都应实践“仁”。

在人类试图在当下这个危险时期摸索出一条前进之路方面，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是重中之重。³⁴ 中西文化中的许多人都认为二者有着无法避免的“文明冲突”。事实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中世纪还是现代世界，私有财产、市场扩张和对利益的追求一直是刺激人类实现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都一直在努力应对“教化”资本主义的复杂问题，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如今，中国正在试图“古为今用”。其核心在于“阴”“阳”之间动态平衡的思想，以“正和”的方式实现“中庸”。这种思想有可能在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在西方“启蒙”价值观与东方“儒家”思想之间只取其之一的两极化选择只会破坏为了共同利益监管资本主义全球市场方面的进步，目前所有国家不可避免地都是这一全球市场的一部分。

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是人类自己目的性活动的产物，主要表现在经济体系中。通过人类的集体力量可以解决这些矛盾。如今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会迫使人们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物种的生存。³⁵ 人类除了有竞争和破坏的本能之外，另一种本能就是通过合作保证生存。可能只有接近“最后时刻”时，人们才会最终被迫开始摸索通向全球合作解决方案的出路，这是 21 世纪共产主义的本质。随着人类望向眼前的深渊，“黄

³⁴ 近年来，爆发“文明冲突”和“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大规模传统的、网络的、甚至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已成为国际关系讨论的核心主题。

³⁵ 达尔文坚持认为对“自然选择”这个术语的理解应该基于其“广义的隐喻意义，包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依赖，（更重要的是）不仅包括个人的生命，还包括后代的成功。”达尔文认为这是人类独有的道德品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相互支持和对爱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的关键（Darwin, 2004）。

昏”的来临可能是推动全球合作的最终动力，这种全球合作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特征：“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分才展开翅膀”（Hegel, 1952: 13）。共产主义是为了人类作为物种得以生存的“没有选择的选择”。³⁶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以务实的方式寻找最符

³⁶ 见 Nolan (2016)。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对如何翻译英文“communism”一词有着热烈的争论。这个词很容易从一种欧洲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欧洲语言。但是，汉语本身的特性对翻译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即如何翻译英文“communism”这个词，或是其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或俄语中对等的词。中国本来可以选择使用音译方法翻译英文“communism”一词，但是这对中国人来说等于是造了一个奇怪的词（譬如可缪尼主义），而且也没法表现出 communism 这个词的意思。在欧洲语言中，这个词可以进行广泛的解释，但它不一定意味着财产的共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争论中，有人建议中文翻译应该反映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政府官员所具有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准则，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的传统。当时建议的中文翻译包括大同主义、社团主义、共享主义和共同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版《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对无产阶级运动的看法，即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Marx and Engels, 1952: 5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一起为 1872 年德语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着重指出“不应特别强调”在 1848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革命措施，因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对（《宣言》中）原则的实际应用始终都取决于当时存在的历史条件”（Marx and Engels, 1952: 8）。换句话说，不能将共产主义机械地等同于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共产主义的具体形式，即将“魔鬼力量”置于共同的控制之下以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事实上，最终选定了共产主义作为对“communism”的翻译，中文字面意思是“财产共有的主义”。该翻译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表达的预想，即会有那么一天“一切生产都集中在整个国家的大联合体的手中”，无产阶级已经“逐渐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所有资本”并且“将所有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Marx and Engels, 1952: 74 and 76）。到恩格斯为 1893 年意大利版《共产党宣言》作序时，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英国这一工业革命的中心地带，大规模工业和金融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 1848 年的水平，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所预言的“社会战争”（social warfare）并没有出现，选举权也已经扩展到几乎所有男性的工人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形成向新型社会形态演变过渡的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在 21 世纪，虽然 communism 的基本原则依然保持不变，但是从正在加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中出现的 communism 的具体形式将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所预见的截然不同。随着中国继续

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市场监管方式。中国在以积极的方式将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动态力量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务实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调控相结合,这方面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建立以道德为导向的和谐的全球政治经济做出宝贵贡献,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全面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这是为了全人类的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彼岸是一个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和平安全地生活、平等地获得可以实现自我的方式和手段的世界。

参考文献

Avineri, S., 1969,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s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Avineri, S., 1968,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oit, Bertrand and James Wilson, 2008, “German president complains of financial markets ‘monster’ ”, *Financial Times*, 15th May.

Braudel, F., 2002,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Penguin Books.

Breman, J., 1996, *Footloose Labour: Working in India's Inform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man, J., 2013, *At work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of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son, R., 1972, *Silent Spring*, London: Pengui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2).

Credit Suisse, 2016,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 Zurich: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推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个词的真正内容,以及相关的如何翻译这个词的问题仍然至关重要。

Darwin, C., 2004, *The Descent of Man*, first published 1979, London, Penguin Books.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BERR), 2008, *The 2008 R&D Scoreboard*, London: BERR.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EU R&D Scoreboard*, Luxembourg: EU Public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EU R&D Scoreboard*, Luxembourg: EU Publications.

Floud, R., J. Humphries, P.A.Johnson, eds., 2014,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II,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zeley, I., 2014, “Income and living standards” , in *Floud et al*, 2014.

Hegel, G.F., 1952,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nglis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1820).

Huang, Lihong, 1984, *A Complete Book concerning Happiness and Benevolence: A Manual for Local Magistrat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International Energy Association (IEA), 2007, *World Energy Outlook*, Paris OECD.

IMF, 2016,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April, Washington DC: IMF.

IMF, 201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nline.

Johnson, S., 2009, “The quiet coup” , *The Atlantic*, May, 46-56.

Kanbur, R., Y.Wang and X.Zhang, 2017, “The great Chinese inequality turnaround” , VOX, CEPR, 15th March.

Kant, E., [1784],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 in Kant, 1991.

Kant, E., 1991,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nry Kaufman, 2009, *The Road to Financial Reformation*, Hoboken, John Wiley.

Keynes, J.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Lackner, C. and B.Milanovic, 2015,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30,

no 2, pp.203-232.

Lewis,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 Manchester School, May.

Maddison, A., 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Available at: [www. 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Marshall, A., 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first published 1890).

Marx, K., and Engels, F., 1952,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48).

Marx, K., 1967,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1867, and English in 1886).

Marx, K., 1971, *Capital*, Vol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94 and English in 1908).

McKinsey, 2015, *Debt and (not much) Deleveraging*, Lond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ilanovic, B., 2007, “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 , in D. Held and A. Kaya, eds., *Global In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Milanovic, B., 2016, *Global Inequalit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Minsky, H., 1986, *Stabilis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edham, J., 1970,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lan, P., 2009, *Crossroads: The End of Wild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London, Marshall Cavendish (中文版《十字路口：疯狂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类的未来》, 中信出版社)。

Nolan, P., 2012, *Is China Buying th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中文版《中国能不能“购买”世界?》, 红旗出版社)。

Nolan, P., 2016, *Understanding China: The Silk Road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Routledge (中文版《认识中国：从丝绸之路到《共产党宣言》》, 中信出版社)。

Nolan, P., Zhang, Jin, and Liu, Chunhang, 2007,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and the Cascade Effect*, Basingstoke: Palgrave (中文版《全球商业革命：产业集中、系统集成与瀑布效应》, 南开大学出版社)。

- Pic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rvard: Belknap Press.
- Platt, Eric and Mamta Badkar, 2016, “Negative-yield debt breaks \$10tn level for first time” , *Financial Times*, 4th June.
- Prahalad, C.K. 2004,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 The Royal Society, 2011, *Knowledge, Networks and Nations*, London: The Royal Society.
- Sender, H., 2016, “Obituary for Karl Case” , *Financial Times*, 29th July.
- Shiller, R., 2001,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 [1761],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edition (revised edition) (1982).
- Smith, A.,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nnan edition (1976).
- UNCTAD (贸发会议) , 1994,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UNCTAD, Geneva.
- UNCTAD (贸发会议) , 200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UNCTAD, Geneva.
- UNCTAD (贸发会议) , 2016,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UNCTAD, Geneva.
- UNDP, 200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8*, New York: UNDP.
- UNDP, 201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New York: UNDP.
- Watling, C. 2017, “Blame Basel capital rules for the UK’s house price bonanza” , *Financial Times*, 15th June.
- Willis Towers Watson, 2016, *The World’s 500 Largest Asset Managers*, New York: Wills Towers Watson.
- Wolf, M., 2004, *Why Globalisation Work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olf, M., 2013, “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Emerging Economies in an Age of Financial Crises” , Asia Economic Policy Conferen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 World Bank, 197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Building Institutions for Markets*,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6,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Wildlife Fund, 2016, *Living Planet Report*, Gland: Switzerland.